

看世界

一便士强取一百年特权

□ 孙亚军

国际

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

一个国家的资源命脉，可以被另一个国家掌控多久？

美国给出的最新答案是，100年。美国近日宣布，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，所谓“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合作协议”：美国获得委内瑞拉超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，一家由美国控制的公司拿下了委内瑞拉17个核心油田的特许经营权。

消息一出，国际舆论批评如潮。“美国不择手段掠夺委内瑞拉资源”“在国际石油工业史上没有先例”“是现代版的炮舰外交”……多位专家表示，虽然委内瑞拉过去也曾向外国企业发放过资源开采许可，但此次协议性质完全不一样，“非同寻常”。

第一重不寻常在于美国“带枪分红”。按照美方说法，美国政府将与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伙伴（NABEP）的公司合作开采石油，美国国防部持有其母公司35%的股权权益，主导石油生产业务。这意味着，委内瑞拉核心资源的经营控制权，被交到了“外国军方”参股的公司手里，而它获得的“17个油田的特许经营权”，涉及储量约占委内瑞拉石油总储量的五分之一。

而且，根据外媒报道，美方拿到的是“便士认股权证”，通俗理解就是，以接近一便士一股的超低价格获得未来购买公司股份的权利。这类权证被发明出来的本义是“企业给员工或早期投资人的激励工具”，但当美方用它来收购海外石油资产时，相当于强行改变了权证的性质，从激励变成了强兑。

更狠的是，权证还内置了“反稀释条款”——未来，若NABEP发行新股融

资，美方这35%的权益不会被摊薄。这意味着，美方不仅以几乎无偿的价格坐上了股东席，而且连以后融资可能摊薄自己股份的可能性，都提前堵上了。

第二重不寻常是近乎白占便宜的采购价。

同样按照美方说法，NABEP油田20%的产出，美国可以按成本价购买；剩余80%，也享有优先购买权。此外，美国政府对NABEP董事会的所有任命拥有否决权，且董事会大多数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。通过这套丝滑的“小连招”，美国获得了该公司可持续的控制权，并借此长期确保获得稳定、低价的能源供应。

连收税这层附着在油价上的“皮”，美国都已经提前“扒”好了。按成本价购买的那20%的石油，并不会在NABEP账面上产生任何利润，企业自然不用向委内瑞拉政府缴纳一分钱税收。剩余80%的油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一定利润，但用脚指头想都知道一定多不了。换句话说，同一桶油，美国要占两遍便宜。

第三重不寻常自然是100年的超长期限。

这里面还牵涉一个细节：美方宣称的期限是100年；但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对国内公布的时间是25年。这并不是双方没有谈妥，而是“语言的艺术”。

白官情况说明显示，美方的相关数据是按照“第一个25年”来计算的，所以25年其实只是会计算周期，但特许经营权本身会存续100年——当事双方，各自只说了对自己有利的半句。

第四重不寻常则在于非美外资企业“躺枪”。

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3000

亿桶，是名义上的世界第一。但其主体其实是奥里诺科重油带的特重质原油。由于其在常温下黏度极高，流动性差，接近沥青状态，加上含硫量较高，加工过程中易出现毒化反应，因而开采及加工难度极大，真正被开发的部分并不多。

但此次协议中的17个油田，“成色”完全不一样。这些油田均处于稳定产出期，且多个油田均已与外资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。现在，外资企业已经完成前期投入，终于进入实际经营阶段，正是收回成本和赚取利润的关键时期，却遭遇美国直接出手“横刀夺爱”。

美国为何宁可撕破脸皮，也要强取委内瑞拉的资源控制权？

供应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因为中东冲突，美国的能源缺口明显扩大，战略石油储备已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美国政府此前多次表示，会寻找“创新方式”补充战略石油储备，以保障国内石油供应的稳定。这个“创新方式”就是但不仅限于悍然出兵委内瑞拉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，与委内瑞拉的交易“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”，并在未来很长时间“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”。另有机构测算，自今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起，委内瑞拉约一半的石油产量流向了美国。

供应结构是另一个原因。美国虽然是全球重要产油国之一，但本土原油产出以轻质原油为主，重质原油供给高度依赖进口。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，约占全球17%，且多为重质原油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美国石化能源结构中最严重的短板。

对此，特朗普直白地宣称，委内瑞拉的石油是“委内瑞拉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”。

实际上，美国盯上的，还不仅仅是石油。委内瑞拉天然气探明储量居全球第八位，金矿储量居全球第四位，铝土矿探明储量居全球第三位，还拥有丰富的钛、镍、铁矿石等资源。最近有外媒披露，美国在掌控委内瑞拉石油后，正在寻求进一步获取该国包括黄金在内的关键矿产资源，不断扩大对委内瑞拉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影响力。从长远来看，这种资源控制可能会给委内瑞拉带来国民财富流失、国内消费能力萎缩、贫富差距扩大、社会动荡加剧等后果，进一步制约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。

说到底，这份所谓“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合作协议”，既没有合作，也不是协议，不过是殖民时代的旧梦在21世纪的新变体。

悦读

□ 肖瀚

经济学家？水管工！

您有这样的困惑：

为什么经济学理论那么多、模型那么复杂，但好像总是和现实生活脱节？尤其是当全球经济处于复苏乏力、债务膨胀、地缘风险上升、能源价格高企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共同作用的“艰难时期”，经济学能发挥多大作用？

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·班纳吉和埃斯特·迪弗洛联袂撰写的著作《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》中给出的回答是：好的经济学不是灵丹妙药，而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以人本中心，设计可执行、可检验的政策方案。经济学家应该把自己看作“水管工”，用“基于科学的直觉、经验辅助的猜测和大量的试错”解决问题。

多年来，西方经济学一直致力于模仿物理学的精确与简洁，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。但班纳吉和迪弗洛用10多年的田野实验和随机对照试验证明：经济学更需要用灵敏的耳朵去倾听那些被宏观数据抹平的微观音声，用同理心去体会那些被理性假设忽略的非理性选择。其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预测世界，而在于接受世界的黏性，并在黏性中寻找撬动发展的支点。

要理解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贡献，需要将其观点置于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谱系中。

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，至今仍是经济学家理解长期增长的基本框架。索洛模型的核心结论是，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，而非单纯的资本或劳动力投入。但代表“技术进步外生性”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模型难以解释的“黑箱”。一个典型佐证就是，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1920年至1970年间年均增长1.89%，而在1970年至1995年间骤降至0.57%，至于原因，到现在学界也没能搞清楚。

但班纳吉和迪弗洛对索洛的“黑箱”说法持怀疑态度——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真的没有规律可循，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只能袖手旁观，这显然不符合过去40年东亚各经济体的增长奇迹。

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·罗默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“内生增长理论”，直接回应了索洛模型的缺陷。罗默的观点是，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，其溢出效应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步入收益递增轨道。比如，在硅谷等高技能人才集聚的环境中，思想的碰撞更容易产生类似“交叉授粉”的化学反应，使创新能够自我加速。

对于罗默的理论，班纳吉和迪弗洛同样持审慎态度。他们承认思想溢出效应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同时也认为罗默的观点过于简单化：思想溢出并非自动发生，需要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。这意味着，好的经济学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还必须直面现实

约束。“如果你想知道某项政策是否有效，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在现实中进行随机实验。”

在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，传统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，假设了一个没有摩擦的平滑世界——人们能随心所欲地换工作、搬家、创业；资源会自动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。但“这不是真实世界，而是经济学家虚妄的幻想”。

劳动力流动不容易。现实生活中，人们会综合考虑家庭纽带、生活成本以及陌生环境可能带来的不安全感。这就是为什么，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，希腊失业率一度攀升至27%，但仅有3%的人选择到欧洲其他国家工作。

资本流动也不容易。在贸易一章中，作者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施托尔珀—萨缪尔森定理经常失效。施托尔珀—萨缪尔森定理是国际贸易理论中分析收入分配效应的核心理论，大致意思是，商品价格上涨会提高生产该商品需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报酬，同时降低其他要素的实际报酬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只要那些劳动力充裕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开放贸易，劳动者收入就会上升，资本收益就会下降，收入不平等现象就能得到缓解。但历史经验表明，墨西哥、哥伦比亚、巴西、印度在贸易自由化后，不平等现象反而加剧了。

类似的矛盾，书中还列举了很多。这一系列模型与现实的背离，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：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危险的缺陷，不是结论错了，而是前提错了——他们假设了一个



不存在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没有根，资本没有惯性，制度也没有延续性。但真实的人类社会，是由社会关系、人际关系、信任关系等编织而成的网络，忽视这些“非经济”因素的经济学是不负责任的。

行文至此，终于回到了书名——“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”究竟应该什么样？

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看来，谦逊的勇气或许才是答案。

好的经济学需要承认经济模型不是永远有用的，承认有很多问题是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尚不能完全解释的，承认再完美的政策设计也难免受制于现实社会的政治、环境与舆论影响。换句话说，好的经济学提供的不是“确定性的标准答案”，而是一种思考方式——以事实为锚、以证据为尺、以人为终极目标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》不仅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理论的著作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理性的方法论。而这，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中国云南出产的咖啡豆越来越多出现在新西兰主要城市的咖啡馆中。

提起咖啡产地，人们通常想到巴西、哥伦比亚、埃塞俄比亚等地。如今，这一印象正在发生变化——中国云南正在成为全球咖啡版图上的“新面孔”。

总部位于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MQ Coffee，致力于在当地推广云南咖啡。MQ Coffee联合创始人王彦琦说，近年来云南咖啡品质明显提升，海外消费者对云南咖啡的关注度持续增加。

“云南精品豆一年比一年好。”新西兰咖啡培训师张雪告诉记者，云南精品咖啡在风味表现和品质稳定性等方面吸引力越来越强，受到业内广泛关注。

云南咖啡品种特色鲜明、风味调性丰富，目前已形成普洱、保山、临沧、德宏、西双版纳和怒江六大核心咖啡产区。普洱咖啡和保山小粒咖啡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互保名录。

据昆明海关统计，2026年前8个月，云南省出口咖啡1.1万吨，价值4.5亿元，主要出口至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德国等42个国家和地区，出口货值居全国首位。2025年，云南省向新西兰出口咖啡生豆195.6吨，出口额1020万元。

昆明畅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今年3月向新西兰出口了约1吨咖啡豆。该公司总经理王士钊介绍，新西兰咖啡文化深厚，知名旅游城市昆斯敦有许多咖啡馆，当地比较受欢迎的沃尔夫精品咖啡馆就进口了云南咖啡豆。云南的铁皮卡咖啡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，其他品种比如卡蒂姆、萨奇姆的口碑也不错。

对于云南咖啡而言，进入国外咖啡馆只是第一步。新西兰咖啡市场经过多年发展，进口、烘焙、批发和零售等环节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链。对于刚刚进入当地市场的中国咖啡产品来说，如何建立起稳定的销售渠道并扩大消费群体，把消费者的新鲜感变成持久的竞争力，是需要应对的课题。从赢得关注到吸引稳定的消费群体，云南咖啡“漂洋过海”的故事，正展开新的篇章。

易爱军

陈正安

庄北宁

本版编辑 韩叙 王一伊 美编 高妍